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责任的重负

布鲁姆、加缪、
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Tony Judt

[美] 托尼·朱特◎著

章乐天◎译

生活在一个不負責任的时代
我们该如何经历，并反对这个时代？



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
以三位重负责任的知識分子
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Tony Judt

责任的重负

布鲁姆、加缪、阿隆
和法国的20世纪

[美] 托尼·朱特◎著
章乐天◎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 (美) 朱特著；章乐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ISBN 978-7-5086-4658-9

I. ①责… II. ①朱… ②章… III. ①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法国—20 世纪 IV. ①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9136 号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y Tony Judt

Copyright © 1998, Tony Jud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 20 世纪

著 者：[美] 托尼·朱特

译 者：章乐天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17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658-9/D·290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弁 言

这几篇文章最早是为芝加哥大学的布莱德利讲座而创作的。谨向布莱德利基金会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罗伯特·丕平教授表达我的谢忱，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的机会。

纽约大学欣然准予我请假去进行此项讲座和其他项目，其间的1995年，我在维也纳人类科学研究院（IWM）访学，大众汽车基金会对我的膳宿给予了部分资助。我感谢这些机构的襄助，感谢IWM院长克莱斯托夫·米夏尔斯基教授始终如一的热忱招待。这本书的撰写出版所费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 T·戴维·布兰特给予了我极大的耐心和支持。

写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两篇文章都在西北大学、密歇根州大学、麦克吉尔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公共讲座和研究会上发表过，观众和参与者以及我自己在纽约大学法国研究所的学生提供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的贡献使这本书更加完善。自然，这本书是以我的风格写成的，其中的错误也由我本人承担。

书中所引有关这三个主题的外语文献绝大多数系我自行翻译，未使用现成的英语译本。例外的情况我也在注解中做了说明。注解中有原文出处的完整名称，书末的“进一步阅读”中给出了一些关于更多相关阅读的提示。

我以这本书纪念弗朗索瓦·傅勒。这几个讲座最初就是应他的邀请而准备的，在他的积极鼓励下，我把讲座题目定为“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傅勒敬仰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在思想上和私交上与雷蒙·阿隆走得最近。他在巴黎主持一个以阿隆的名字命名的机构；他去世时正在从事一项关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或许是阿隆最喜欢的法国思想家——的研究。但在某种意义上，傅勒也是布鲁姆和加缪的天然传人。他

对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既拒绝马克思主义阐释方法，又拒绝新传统“文化史”进路，确立了他作为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反对派的地位。他勇敢谴责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伪善——不管是“反共产主义”的还是“多元文化”的——令他在法国内外遍树政敌。他对法国历史的阐释在公众中的影响日益增长，激起了反对者的强烈痛恨，最著名的一次爆发就是在大革命 200 周年之际，对傅勒及他的“学派”的攻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人身化和个人偏见化的倾向。

所有这些遭遇，对这几篇论文研究的主角而言都是家常便饭了。和他们一样，弗朗索瓦·傅勒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作为“局内人”的素质不能为他免除在各个时间、各种圈子里被视为局外人甚至叛徒的危险。和他们一样，傅勒至少在两个方面被视为异类：首先，他颠覆并重写了法国大革命史——法兰西民族的“创世神话”；其次，他在晚年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谈共产主义这一 20 世纪的神话（或用傅勒的话说：“幻象”）的论文。和他们一样，他在国外的声誉很多时候高于国内；和他们一样，他的影响和思想战胜了他的批评者，其生命力必将比后者更长久。人所共知，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存在一个法国历史的傅勒派。但同样，也不存在一个法国社会思想的阿隆派，法国道德主义的加缪派，法国社会民主的

责任的重负

布鲁姆派。在法国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这些人都不自成一党一派，与人争斗；他们归根结底只代表他们自己和自己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迟早会成为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目录

弁言

I

导论

巴黎之误

001

第 1 章

被遗弃的先知

莱昂·布鲁姆和妥协的代价

037

第 2 章

不情愿的道德主义者

阿尔贝·加缪和暧昧的难堪

125

第 3 章

局外的当局者

雷蒙·阿隆和理性的报应

201

进一步阅读

268

译后记

六十年后,一个更重的赌注

273

译名对照表

285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

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幻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

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

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

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1〕}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

〔1〕 参见皮埃尔·诺拉编《记忆地》，7卷本，（Paris: Gallimard, 1984—1992）。

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